

冬至大如年

——冬至节俗的传统意义

□ 萧 放

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冬至，今天在一般人看来，它似乎只有时令标记的意义，并且由于生存条件的改善，以及全球气候的变暖，人们已很少有对隆冬的深刻体验，寒冬不能构成致命威胁，冬至自然也就难以引起常人的注意。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，冬至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，人们不仅将其视为时气变化的座标，将冬至所在的月份奉为“天正”，而且它在古代也曾长期被视为一个与新年媲美的人文节日，号称“亚岁”、“小岁”。其实，冬至在上古就是新年，在历法时代之前，人们通过天象观测，很早就发现了冬至点，并以此作为年度时间循环的起点。冬至居于新旧更替的时节，在古人观念中自然也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，冬至节俗中诸多年俗内容就来源于人们对这一时节的感受。冬节与春节在岁首民俗方面有着明显的联系，人们常将冬至与大年对举，民间至今流传着“冬至大如年”的俗语。从这句口承俗语中，可见冬至在民间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。

冬至又称长至。冬至这天离开北回归线的太阳到达了最远点，由于照射角度的关系，冬至北半球接受太阳照射的时间最短，因此，这天成为一年中白昼最短、夜晚最长的一天；从冬至开始，太阳北归，北半球接受日照的时间愈来愈长，白昼也就越来越长，这就是湖北民谚所说的“冬至日头升，一天长一针”。古人从生活经验出发，根据光照与季节寒暖的变化，生发出阴与阳的观念，并以此理解宇宙万物的变化，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根源于阴阳二气的运动，四季气候的变换来源于阴阳的消长，阴阳始终处于相反相承的变化之中，阴盛则阳衰，

阳盛则阴衰,阴阳协调,万物和顺。在古人的观念中,人作为宇宙的一分子自然应遵循宇宙的节律,顺应阴阳的变化发展,特别是在阴阳转化的关节点上,人们应该主动顺应和助长生气,否则,就可能遭遇时疾。正是由于季节变化容易造成人体的不适,因此人们特别注意阴阳交替的时刻,对阴阳转换的时日予以充分重视,采取种种方式促成阴阳的顺利转化,于是这些关键时日的人事活动逐渐成为特定的岁时习俗。夏至与冬至就是一年中阴阳变化的两大时间点。夏至阳盛阴生,夏至节俗的中心是抑阳助阴;冬至与此相反,冬至阴气盛极而衰,一阳来复,冬至节俗自然围绕着顺阳与助阳的方向展开。在以冬至为岁首的时代,冬至还是一个盛大的年节,从后述冬至节俗中,我们不难发现冬至节中的诸多年俗内容。

拜天颁历。阴阳家的观念认为,天阳地阴,对天地神灵的祭祀亦顺应着不同的时气。在阳气发动的冬至,礼敬天神人鬼;在阴气始生的夏至,祭祀地祇物怪。《周礼·春官》:“以冬日至,致天神人鬼。以夏日至,致地示物魑。”从历代宫廷祭祀看,人们依照天圆地方的原则,冬至圜丘祭天,夏至方泽祭地,北京的天坛就是明清帝王南郊祭天、亲迎冬至的神圣处所。帝王号称上天之子,他们作为上天的人间代表,依照天神的意志管理人事,因此与天神的沟通是帝王的重大政务之一。冬至时节的祭天活动就是一特定的天人沟通仪式,历代帝王均将冬至视为盛大的朝仪活动日,冬至节仪被称为“国之大典”,在冬至这天南郊祭天,朝会群臣与各国使节,共贺佳节。冬至时节,北斗星柄初昏时北指子位,即《尚书》所说:“日短星昴,以正仲冬。”在以北极星为时空坐标的古代,冬至是一个推算历年的重要天文点。因此,不仅历法的编订一定要考虑到冬至点,而且,历法的颁布也大都在冬至日。元朝,“太史院以冬至日进历”,此后市面上才有新历流行(《析津志·岁纪》)。这种习俗播及东亚,清代朝鲜在冬至日不仅颁发历书于百官,而且有“冬至之历,吏献于官”的俗习。此种馈送历书的风俗还扩展到“乡曲亲知,墓村田庄”,颇似我们今天年终互送挂历的风气(见《东国岁时记》)。

祭祖贺冬。冬至月在古代曾在较长时期内作为岁末之月或岁首之月,殷代年终大祭“清祀”在冬至所在的十一月。清祀是以祭祀祖妣

为主、兼祀百神的祭礼，类似于周人十月的年终祭礼大蜡，汉代改用夏历后将大蜡礼移至冬至后立春前的十二月，无论是孟冬、仲冬还是季冬，作为年终祭礼的祭祖典礼，它是围绕着冬至这一时间点形成的。在阴阳交战、寒风凛冽的时日，人们为了顺利度过新旧交接的时间关口，需要有集体的信心与凝聚的核心，因此他们求助于与自己关系至为密切的祖灵，在祭祀祖先的仪礼活动中返本归宗对族群关系进行了再确认。这种年终祭祖习俗历代传承，东汉民间，冬至节前数日就清洁斋戒，冬至之日，以黍米与羊羔祭祀玄冥之神（北方水神）与祖宗（见崔寔《四民月令》）；宋人在冬至“祭享宗祧，加于常节”（吴自牧《梦粱录》）。明清以后南北民间依然以冬至为祭祖日，“清明扫墓，冬至祭祖”成为通行的民间俗语，清代北京的旗人在冬至祭“祖宗杆子”，祭后亲朋围坐，分吃祭过祖宗的“白肉”。南方的福建在冬至节这天，以一种米粉做的团子祭祖，有的还在门口挂两个米团。传说它源自一个孝子的故事，说从前有一个人在山中迷了路，碰上一只母猿，并和她住在一起，母猿为他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就带着儿子回家了。这个儿子后来做了大官，他想让妈妈回来和自己一道生活，就让家人到山里去，在通往他家的大树上都挂上米粉团，当然，家门口挂得更多。又老又饿的母猿追随着米团来到家门口，这时儿子出来迎候她，并留下她一起生活。为了纪念这个孝顺的儿子，从此有了冬至节挂米团的风俗（参阅林耀华《金翼》第六章“村里的节日”）。这个人与动物的婚姻故事，未免神奇，但却生动地体现了人们在冬至时节对祖先的感恩情意。

祭祖活动常常与新年连在一起，从北半球回归年角度看，冬至才是真正的新年，在古代的确也曾较长时间内以冬至为新年（周朝以冬至所在的斗建子月即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；白族历法以十一月为岁首，认为“冬大年小”，其冬至节十分隆重，杀猪宰羊，邀集亲朋好友，接出嫁姑娘来家过节），因此冬至节在古代及现今一些民族地区作为年节，民间的“贺冬”实质上就是“贺年”，现今民间冬至节中诸多习俗正是古代年俗的传承。在冬至日，王室祭天朝贺，平民百姓则祭祖团聚。

古代南北居民都很看重冬至。中古时期年节、寒食、冬至并称三

大节,冬至被视为“亚岁”。唐人又以“小岁”称冬至,白居易在小岁日对酒吟出了“一杯新岁酒,两句故人诗”的佳句。宋人最重冬至,冬至在民间生活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年节,民间有“肥冬瘦年”之谚。事实上,宋人将冬至作为年节来过,孟元老在追忆东京(今开封)节令生活时说:“冬至、京师最重此节。虽至贫者,一年之间,积累假借,至此日,更易新衣,备办饮食,享祀祖先,官放关扑,一如年节。”(《东京梦华录》卷10)人们在冬至节间,互相馈赠节物,在冬至前一夜要守冬,如年节守岁,因此将冬至前夜称为“冬除”或“除夜”。宋金盈之《醉翁谈录》有“守冬爷长命,守岁娘长命”的说法。冬至很早就有了祈寿添岁的民俗。在原始的民俗观念中,人与自然同禀一气,在一阳复始的时节,人们只要能与自然同步相应,就会获得新的生命力。老人是家庭的尊长,在小孩添岁的同时,尤其要为老人延寿。为老人祈寿的民俗之一是,妇女给家里的长辈奉献新作的鞋袜,古代称之为“履长至”。这种习俗乍看只是晚辈在向长辈表示孝心,如果我们稍加探究就不难明白蕴含其中的民俗意义。此俗兴起于阴阳观念浓厚的汉代,《中华古今注》载“汉有绣鸳鸯履,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”。曹植曾作《冬至献袜履颂》文,北魏崔浩在《司仪》中说:近古妇女常以冬至日进履袜给公婆;北朝人不穿履,当进靴。无论靴履,都在于其“践长”的象征意义。靴上的文词,正体现着其“祈永年,除凶殃”的巫术动机,这种文词有“履端践长,阳从下迁,利见大人,向兹永年”等(《玉烛宝典》卷11)。在一阳新生、白昼渐长的时节,年轻后辈及时给老人奉上新鞋新袜,其显见的作用是帮助老人过冬,但其更重要的是民俗礼仪意义。通过这样的献履仪式,使他们在新岁之始,以新的步履与时俱进,健康长寿。唐代洛阳人冬至戴一阳巾,明冬至宫服绘绵羊图(以羊代阳)等,都与新鞋新袜一样是冬至应节的服饰。我们今天在春节拜年时还要换上一套新衣服,以新的打扮适应着新年,虽然我们已不太注意其背后的文化意义,但仍传承着这一岁时生活的习惯。

庆贺冬至的食品与冬至服饰一样,也有着顺阳助长的象征意义。冬至节令食品最典型的是馄饨。俗有“冬至馄饨夏至面”的说法,现今四时皆吃的馄饨在过去是冬至的专门食品。古人认为冬至时节阳气虽生,但阴阳包裹,阳内阴外,正与夏至相反,夏至食粽是为了剥

阳释阴，冬至食馄饨却为了破阴释阳。馄饨形如鸡卵，颇似阴阳未分时的一团浑沌，在阳气始生的冬至日，人们食用馄饨，以模拟的巫术形式破除阴阳包裹的混沌状态，支助阳气生长。乾隆《河南府志》岁时民俗条记“冬至，祀先祖，食馄饨，取阴阳胚胎，包孕浑涵”。民间还因馄饨谐音混沌，意即糊涂不开窍，于是说吃掉馄饨，“可益聪明”。在以米食为主的南方，冬至日吃米面制成的圆形食品，称为“团子”或“汤圆”。人们在冬至日凌晨用它献神祭祖，然后阖家团聚共食，称为“添岁”，犹如今北方春节吃饺子。南朝荆楚地区冬至吃赤豆粥，这是一种有特殊攘疫功用的节令食品。根据冬腊节俗的内在关联，后世的腊八粥很可能由冬至的赤豆粥演化而来。

贺冬犹如贺年，冬至前夕，亲友之间相互馈送节令食品。宋人是“至节家家讲物仪，迎来送往费心机”，人们为冬节应酬颇费思量，但这些节物往往转来转去，又转回自家门下（见周遵道《豹隐纪谈》）。虽然节物转回不免令人尴尬（宋人的这种遭遇，在今天也不时出现），但节物在馈送传递中已实现了亲友之间的“互惠”原则，完成了它强化亲族联系的职能。这种馈送节礼的习俗在清代吴地还颇流行，冬至节前，人们“提筐担盒”往来于道路，在当地称这些冬至食品为“冬至盘”（顾禄《清嘉录》）。人冬至日，亲戚间互相拜贺，特别要拜贺尊长，称为“贺冬”或“拜冬”。唐人杜牧以诗的语言记述了他在冬至日接受小侄拜贺的亲情：“去岁冬至日，拜我立我旁。祝尔愿尔贵，仍且寿命长。”冬至祝拜的习俗在南宋更为热闹，杭州最重一阳贺冬，五鼓时分，华丽的贺冬车马已奔涌于九街之上。清朝吴地还传袭着这一清晨拜冬的习俗，吴歌云：“有几人家挂喜神，匆匆拜节趋清晨。冬肥年瘦生分别，尚袭姬家建子春。”（《清嘉录》）看来冬至在吴地民众生活中有着特别的位置，似乎他们还保留着周朝冬至月为岁首的古俗。

观兆测年。冬至是时气的起点，二十四气始于冬至，所以传统计算时令的基点是冬至。如立春在冬至后的第四十五天，民谣就有：“冬至离春四十五”；人们推算清明在冬至后一百零六日，因此说“冬至百六是清明”。冬至作为新岁之首，自然容易被人作为预知未来人事、年成的特殊时间，一如后世的元旦。在愈是不能把握自己未来命运的时代，人们愈是想预知未来的情况。在靠天吃饭的古代农业社会，人们

尤其关注未来天象气候的变化。冬至日,人们有许多观测天象、预测年成的俗信。有据日影预测。冬至立表测日影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,民国雄县人仍传承着这一方法。在冬至日树起八尺的表木,以测验来岁水旱,大抵以表木长度的中分点为基准,日影中正则丰,不及则旱,过则水(民国《雄县新志》)。这与汉代“晷进则水,晷退则旱”,中晷则“岁美”的判断标准完全一致。这种中长期的年成预报,应该说有它的经验根据。有据日出日落时的云气变化预测。《易纬通卦验》曰:冬至之日,见云送迎,从下乡来,岁美,民人和,不会有疾疫。无云送迎,德薄,岁恶。故其云赤者旱,黑者水,白者兵,黄者有土功。诸从日气送迎,此其效也。还有据冬至天气晴雨判断年节天气好坏,浙江民谚有:“晴冬至烂年边,邈邈冬至晴过年。”

民间的数九游戏,也是从冬至开始数起。冬至处于仲冬时节,是接受阳光最少的一天,但它还不是最冷的日子,由于地面热量发散的时间效应,冬至之后才进入酷寒时节,民间数九习俗即从冬至开始,俗谚有:“算不算,数不数,过了冬至就进九。”“进九”意味着严寒的到来,有民谚为证:“冬至前后,冻破石头。”(郟县)冬寒对于保暖条件简陋的古人来说,的确构成了严重威胁,人们是掰着指头度日。为了纾解在冬寒胁迫下出现的心理危机,挨过漫长的冬季,人们很早就发明了“数九九”的游戏,从寒冬看到春日的希望。人们将从冬至开始的“数九九”的游戏,作为冬令时间的习惯表达,虽然立冬是进入冬季的时气点,但人们从身体感受出发,将冬至作为冬天到来的真正标志。

数九九的游戏包括九九歌诀与九九消寒图两种:从宋元开始,九九歌诀就流传于南北各地,见诸记载最早的大约是宋人陆泳在《吴下田家志》中收录的那首:“一九二九,相唤弗出手;三九二十七,篱头吹箎;四九三十六,夜眠如鹭宿;五九四十五,太阳开门户;六九五十四,贫儿争意气;七九六十三,布衲两头担;八九七十二,猫狗寻阴地;九九八十一,犁耙一齐出。”这种九九歌,在近千年的传承中,虽有着历史与地域的变异,但其记述冬春交接的时间方式没有变化,我们从最近仍在流传的一首九九歌中可得到明证:“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冰上走,五九六九沿河看柳,七九河开,八九雁来,九九加一九,耕牛遍地走。”歌诀流传于庶民之口,它描述的是民众冬日里的时季

感受及户外生活；消寒图则以图画的形式标示着由冬向春的时间过程，主要为闺阁女子、文人雅士所习用。染梅与填字是描画消寒图的两种流行方式。染梅是对一枝有八十一片花瓣的素梅的逐次涂染，“日染一瓣，瓣尽而九九出”。这种梅花消寒图最早见于元人杨允孚的记载，“冬至后，贴梅花一枝于窗间，佳人晓妆，日以胭脂涂一圈。八十一圈既足，变成杏花，即暖回矣”（《滦京杂记》自注）。胭脂红是美人的消寒图，而一般人大都是用墨色涂染梅花花瓣，从冬至日起，九九八十一瓣涂满后，人间已然又是春草绿，故近人常在消寒图旁题联曰：“试看图中梅黑黑，自是门外草青青。”还有与染梅类似的另一种涂圈方式，将八十一圈按九行排列，每行九个圈，从冬至日起每天涂一圈，涂抹的位置视天气状况而定，阴天涂圈上半部，晴天涂下半部，刮风涂左半部，下雨涂右半部，下雪就涂在中间，用当时人的话说，是“上阴下晴，左风右雨雪当中”。这种消寒图称得上是天气变化的统计图。填字是对九个九笔画的字进行涂描，这九个笔画中空的字，大多组成一个独立的文句，一般是诗句，从冬至日起，每天依笔顺描画一笔，九天成一字，九九则文句成。清朝宫廷内曾有帝王御制《九九消寒图》，这种消寒图就是填字图，其九字为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，其语典雅而寓意深远。

无论是九九歌诀，还是九九消寒图，看起来似乎只是一种计算冬时的游戏，但其初兴的动机未尝没有巫术的意义。它们均以九为时间单位，从传统的阴阳术数观念看，九是阳数，九字的叠加意味着阳气的增长。古人认为，冬至“一阳生”，自冬至起，阳气滋长，《史记·律书》云：“日冬至，一阴下藏，一阳上舒。”在阳气上升的时节，人们念叨九九歌诀，特别是涂染傲寒的梅花与象征春意的垂柳，这原本是一种招引春天的巫术仪式，用感应或模拟巫术的手段，促使春天顺利降临。随着人们知识的进步，生存能力的提高，神秘信仰淡化，原始的巫术仪式早已蜕变为游戏娱乐了。